

165829



LUOTUO
CONG SHU

● 骆驼丛书

回忆两篇

杨绛·著

国·湖南人民出版社

回憶兩篇

楊
絳·著

回 忆 两 篇

杨 绛 著

责任编辑：朱 正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5,000 印张：3.125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10109·2013 定价：0.66元

湘人：85—14



楊 絳

前言

我原是在编写现代史上的小“史料”，结果写成四篇回忆，我力求这些材料成为新发现的“史料”，所以把记起的事尽可能核实，追忆的事都慎慎有角，而附记的人也是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第一篇曾在《一九八三年《当代》》第2、第3期发表，第二篇脱稿未久，朱正同志索取这两篇收入《路纪丛书》并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岛碧教授翻译《路纪六记》，还把《回忆我的父亲》译出来（一九八五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她认真地查找和提供了日本方面的资料。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汉学教授（Adele Rickett），我的同学薛鸿时同志，都给我提供可靠的资料。文章发表后，洛陽部队战友徐同志从他童年收集的明信片里，找出我父

作者手迹

前 言

我原是应邀写两份近代史上的小“资料”，结果写成了两篇回忆。我力求这些记载成为名符其实的“资料”，所以把记起的事尽可能核实。追忆的事都琐琐屑屑，而所记的人也是历史上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第一篇曾在一九八三年《当代》第五、第六期发表，第二篇脱稿未久。朱正同志索取这两篇收入《骆驼丛书》并代拟书名。日本大阪女子大学中岛碧教授翻译《干校六记》，也把《回忆我的父亲》译出来（一九八五年みすず书房出版），她还热情地查核和提供了日本方面的资料。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李又安教授（Adele Rickett），我的同事薛鸿时同志，都帮我寻找可靠的资料。文章发表后，洛阳部队戈大德同志从他童年收集的明信片里，找出我父亲从美国寄给我大姊的明信片，赠我留念；宁夏银川市一位财经部门退休干部林壮志同志把我父亲曾受理的一个案件内幕详细告

知。我敬向他们各位致衷心的感谢。

杨 绛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目 录

前 言..... 1

回忆我的父亲..... 1

回忆我的姑母.....70

回忆我的父亲

一九七九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调查清末中国同盟会(包括其它革命团体)会员情况，给我一封信，原文如下：“令尊补塘先生是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物之一，参加过东京励志社，创办《国民报》《大陆杂志》，在无锡首创励志学社，著有影响”，因此要我介绍简历及传记资料等，并提出一个问题：“在补塘先生一生中，有过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主张革命转向主张立宪。这中间的原因和过程如何，是史学界所关心的，盼望予以介绍。”

我只写了一份父亲的简历，对于提出的问题，不敢乱说，没有解答。其实，我虽然不能算“知道”，却也不能说“不知道”，不仅对所提的这一转向，就连以后的转向，我即使不能说“知道”，也都有我的体会。近年来追忆思索，颇多感触，所以想尽我的理解，写一份可供参阅的资料。

我父亲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生于一八七八年，十九岁（一八九七）考入南洋公学，二十一岁（一八九九）由官费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度出国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美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却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不准保释，直到受“停职审查”的处分。我父亲声称他没有违犯宪法。审查结果，他确实完全合法，官复原职。他就辞职回南了。那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说“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時候，对听到的話不求甚解。有些事只是傳聞；也有些是父亲对我讲的，当时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听父母的談話而领会的。

我母亲唐须鬣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十九岁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談話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ère）《人性与世态》（des Caractères）。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把他每

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六、七岁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像片，大概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属的。那张照片先挂在客厅暗厢，不久贬入吃饭间。照片右上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检察长”。我常搬个凳子，跪在凳上仔细端详。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亲，怎么又写着我父亲的名字？我始终没敢发问，怕问了惹笑或招骂，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落款不是标签，也不知什么时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稳自己的理解没错。

我曾问父亲：“爸爸，你小时候是怎么样的？”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可是我叮着问，他就找出二寸来长一只陶制青底蓝花的小靴子给我，说小时候坐在他爷爷膝上，他爷爷常给他剥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那时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个很小的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过一个小地方的官。两代都是穷书生，都是小穷官。

我祖父病重还乡，下船后不及到家便咽了气。家里有上代传下的住宅，但没有田产。我父亲上学全靠考试选拔而得的公费。

据我二姑母说，我父亲先考入北洋公学，我不知他在北洋上学多久。他在北洋的时候，有部分学生闹风潮。学校掌权的洋人（二姑母称为“洋鬼子”）出来镇压，说闹风潮的一律开除。带头闹的一个广东人就被开除了。“洋鬼子”说，谁跟着一起闹风潮的一起开除。一伙人面面相觑，都默不作声。闹风潮不过是为了伙食，我父亲并没参与，可是他看到那伙人都缩着脑袋，就冒火了，挺身而出说：“还有我！”好得很，他就陪着那个广东同学一起开除，风潮就此平息。

当时我父亲是个穷学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费学校，境遇该算不错，开除就得失学。幸亏他从北洋开除后，立即考入南洋公学。我现在还存着一幅一九〇八年八月中国留美学生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开代表大会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学生展着一面龙旗。后排正中两个学生扯着一面旗子，大书“北洋”二字。我父亲就站在这一排。他曾指着扯旗的一人说“这是刘麻子”，又指点这人那人是谁，好像都很熟。我记得

有一次他满面淘气的笑，双手叉腰说：“我是老北洋。”看来他的开除，在他自己和同学眼里，只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大姐从父母的谈话里，知道父亲确曾被学校开除，只是不知细节。我父亲不爱谈他自己，我们也不问。我只记得他偶尔谈这些笑话，都是他年轻时代无聊或不讲理的细事。他有个同房间是松江人，把“书”字读如“须”。父亲往往故意惹他，说要“撒一课‘须’去”（上海话“尿”“书”同音）。松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个胖子，大家笑他胖。胖子生气说：“你们老了都会发胖。”我父亲跟我讲的时候，摩挲着自己发了胖的肚子，忍笑着说：“我对他说，我发了胖，就自杀！”胖子气得咻咻咻咻。我不知道父亲那时候是在北洋或南洋，只觉得他还未脱顽童时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诉我：小哥哥（我父亲）捉了一只蛤蟆，对它喷水念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过了一星期，记起了那只蛤蟆，翻开花盆一看，蛤蟆还没死，饿成了皮包骨头。这事我也没有问过父亲。反正他早说过，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样。

二

《中华民国史》^①上说：一九〇〇年春，留日学生成立励志会；一九〇〇年下半年，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创办了《译书汇编》，这是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诸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穆勒的《自由原论》等书，这些译著曾在留学生和国内学生中风行一时。冯自由《革命逸史》^②也说起《译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以翻译法政名著为宗旨，译笔流丽典雅，于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我曾听到我父亲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我在父亲从国外带回的书里，看到过一本英译的孟德斯鸠《万法精义》和一本原文的达尔文《物种起源》。可是我父亲从没有讲过他自己的翻译，我也从未读过。他也从未鼓励我翻译，也从未看到我的翻译。

① 中华书局版（1981）131—132页。

② 民国廿八年（1939）二月版第一辑147页。

据《革命逸史》^①，一八九九年上海南洋公学派留东学生六人（我父亲是其中一个，杨廷栋、雷奋和其它三人的名字都是我经常听到的）。他们和其它各省派送的留日学生初到日本，言语不通。日本文部省特设日华学校，专教中国学生语言及补习科学。“雷奋、杨荫杭、杨廷栋三人税居早稻田附近，即当日雷等为《译书汇编》及《国民报》^②撰文之所。留学生恒假其地作聚会集中点。”那时有某日本舍监偷吃中国留学生的皮蛋，又有个日本下女偷留学生的牙粉搽脸。我听父亲讲过“偷皮蛋舍监尝异味，搽牙粉丑婢卖风流”的趣闻。但从不知道父亲参与译书并为《国民报》撰稿的事。我大姐只知道父亲会骑自行车，因为看见过父亲扶着自行车照的相片，母亲配上小框放在桌上。

冯自由的《革命逸史》^③和《中华民国史》^④都提到留日学生的励志会里有激烈派和稳健派之

① 第一辑191页。

② 《国民报》是最早提倡颠覆清王朝的刊物，它以鼓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而具特色——《中华民国史》132页。

③ 第一辑151页。

④ 132页。

分；激烈派鄙视稳健派，两派“势如水火”。我父亲属于激烈派，他的一位同窗老友属于稳健派。他们俩的私交却并不“势如水火”。我记得父亲讲他们同班某某是留学生监督的女婿，一九〇〇年转送到美国留学。同班学生不服气。我父亲撺掇他那位稳健派朋友提出申请，要求调往美国，理由是同窗杨某（父亲自指）一味鼓吹革命，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说”的影响。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反正他们的捣鬼没有成功。

《中华民国史》上说^①，“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一九〇一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智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我猜想一九〇一或是一九〇二之误。我母亲不说“励志会”，只说“理化会”。母亲形容父亲开夜车学理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个“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记得父亲晚年，有一次从上海回到苏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我母亲讲“理化会的大成就”。有一个制造“红丸”（即“白面”）的无锡人，当年曾

① 293页。